

洪洞县博物馆藏“尚父簋”浅议

张小星

1996年5月,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化局和洪洞县博物馆对永凝堡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96SHYM2出土两件铜盖簋,其一即为“尚父簋”(图1),该簋通高24.3厘米,口径20.3厘米,重6210克,通体以瓦棱纹及窃曲纹为主,簋内盖、腹均有铭文“□尚父作宝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用”,部分学者据此认为该簋的主人即获封杨侯的宣王子“尚父”。从目前各方对该材料的引用或论述来看,对于铭文中出现的“尚父”是否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宣王子杨侯“尚父”尚存在争议之处。此外,作为晋文化影响下的地域



图1-1 尚父簋 西周



图1-2 尚父簋侧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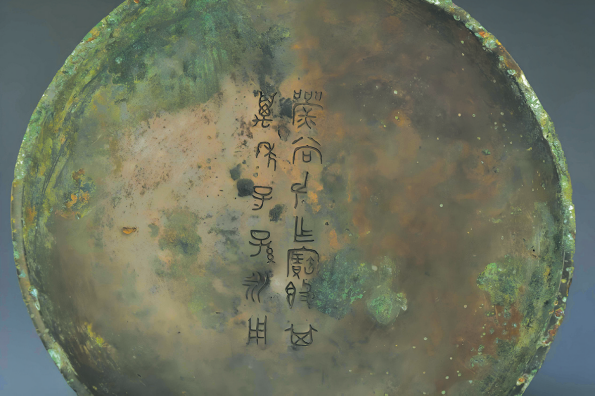


图1-3 尚父簋簋盖铭文



图1-4 尚父簋簋腹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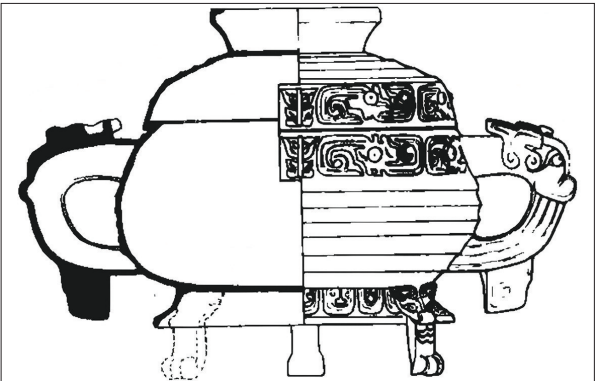


图2 天马一曲村遗址M93:33簋



图3 南阳市博物馆藏
仲再父簋 西周宣王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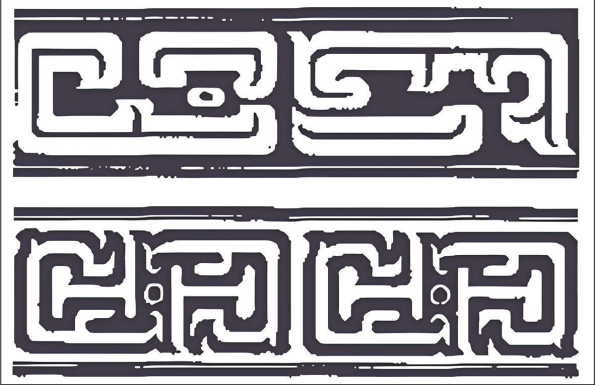


图4 带状窃曲纹(上)与目形窃曲纹(下)



图5 簋伯父父簋 西周中期

遗址,永凝堡出土的尚父簋在造型及纹饰上反映出较为鲜明的晋系青铜器特征,与天马一曲村一带的晋侯墓地遗址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因此,本文从该簋的考古出土情况出发,对尚父簋的形制纹样、鼎簋组合关系以及与古杨国的关系进行梳理。

出土情况

此次发掘是在1980年第一次对永凝堡遗址发掘的基础上对该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发掘地点位于永凝堡村东100米处,处于1980年发掘地点的东北方向。该墓发掘后曾有《1996年洪洞永凝堡西周墓发掘》一文作了详细的报告,此次发掘6个墓葬,其中M3~M6发掘时已被盗掘一空,仅M1、M2遗留部分文物,包括青铜器、玉器及贝类器物等。

其中,96SHYM2是整个永凝堡遗址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墓葬。该墓共出土2件青铜簋,1件青铜鼎,1件铜甗、铜铃以及玉石器、玛瑙器若干,其中尚父簋保存最为完整,另一件青铜簋则缺失簋盖。两簋均出土于棺椁南侧,分列左右,两簋在形制、纹样上重合率极高,可初步断定该墓采用了列鼎列簋制度,由于该墓在发掘前曾遭遇两次盗掘,墓内残留的鼎簋数量已经无法佐证墓葬原有等级。根据发掘报告,该墓葬与同期发掘的96SHYM1在形制及墓葬规格上接近,因此可推断为夫妻异穴合葬墓,且96SHYM2应为主君之墓。根据考古发掘及文物追回情况,96SHYM1在1995年被盗前存有2鼎4簋,说明96SHYM2墓内原始状态下应至少为4簋。

随着1980年及1996年永凝堡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以及附近天马一曲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为遗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尤其是该地与天马一曲村遗址晋文化面貌十分近似,证明两处遗址存在着高度紧密的联系。对比同属晋文化遗址的天马一曲村遗址,根据韦玮《关于晋侯墓随葬器用制度的思考》对晋侯及夫人墓鼎簋数量的梳理,晋侯墓内普遍随葬4簋或以上,晋侯夫人墓内随葬2簋或4簋,而上述推测的永凝堡96SHYM1、96SHYM2中原始用簋数量与此大致吻合,故可初步推断96SHYM2墓主身份与晋侯等级大致相等。

造型及纹饰

尚父簋整体分为簋盖和簋身两部分,口部结构为子母口。盖为盆形,有捉手;器身为鼓腹,腹部两侧铸兽首状半环耳,兽首饰有螺旋状双角,底为敞口圈足,圈足下由三兽足支撑。该簋造型的整体比例和结构与天马一曲村遗址中M93:33簋(图2)以及仲再父簋(图3)等较为接近,属于较为典型的西周中晚期簋类青铜器造型风格。

“尚父簋”以瓦棱纹、窃曲纹为主要纹饰,呈环带状分布于簋盖及器腹。其中,瓦棱纹主要分布于器身和簋盖中部,簋盖三条,器身五条。窃曲纹主要分布于簋盖口沿处、簋身口沿处以及器底圈足处,呈环带状。窃曲纹发展经历漫长的演变过程,且演变出十分丰富的种类,主要分为带状和目形两种基本类型(图4)。带状窃曲纹以器物腹部正中为分界左右对称并呈带状延伸;目形窃曲纹即环带中每一组纹样皆以纹样中间的目状乳丁为核心呈中心对称,如天马一曲村遗址M93:33簋及仲再父簋腹部即采用了标准的目形窃曲纹。

尚父簋盖部和腹部的窃曲纹应是以目形窃曲纹为基础样式,在此基础上取消了目形后的纹样类型,该纹样与筍伯父父簋(图5)上的窃曲纹高度相似,而尚父簋仅保留S形窃曲纹的单一样式,几何化特征更加鲜明,在艺术处理上多采用直线造型,仅在转折处略呈圆角,纹饰凸起部位在环带中更加饱满,其内部的凹陷部分保留极少,甚至接近于后世的阴线刻。

相较于上述多件器物,尚父簋的窃曲纹造型相对简化,几何化特征更加明显,在制作工艺上更便于处理。可见自西周晚期,窃曲纹在原有龙纹、蟠螭纹逐渐简化和几何化的基础上,继续向几何化、平面化发展。而这种简化的窃曲纹搭配瓦棱纹,在丰富装饰效果的同时也降低了器范的制作难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器铸造的时代特征和演变规律。

尚父簋器身两侧为兽首状耳,耳部整体环臂较为粗壮,横截面偏矩形,在宣王时期普遍流行;兽首双目圆睁,顶部为螺旋状双角。兽首通体采用了大量的曲线,使造型更加生动,线条流畅。耳底部采用象鼻状垂耳,基本形态与天马一曲村遗址M93:33簋以及仲再父簋基本一致。

尚父簋器身的造型特征符合西周晚期宣王时期前后三足簋式样,纹样整体平面化、几何化的造型特征尤为明显,反映了西周晚期乃至末期青铜簋装饰造型的演化特征。

铭文“□尚父”与尚父身份

1996年5月,尚父簋出土,其铭文中出现“尚父”二字,其所指代的身份即被普遍认为是宣王之子尚父,即姬姓杨国的初代“杨侯”。铭文首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尚父”身份的认定。目前尚未有确切训释,仅两篇文章涉及该字。其一认为该字尚不可识读,或为“尚父”的私名;其二认为“□尚父”应为同一名称,故其指代与“尚父”是否为同一人尚且需要新的证据予以佐证。

根据吴镇烽《金文人名研究》一文对于金文人名组成方式的总结,尚父簋的“□尚父”铭文中,“尚父”应为单称字“尚”与“父”组合的方式,而首字为行第或氏、国名、爵名的可能性较大,其字义尚待进一步讨论。但可以确定的是:第一,该字为私名的观点与西周时期金文中人名的规律不符,因此该字并非私名;第二,该字只是对应应行第或国名、氏、爵名等人物身份标记的相关信息,并不影响“尚父”作为人名的指代对象。综合对墓葬的随葬器规模等方面的推断,基本可以确定,铭文中的“□尚父”即是宣王之子,被封为杨侯的尚父。

结语

通过对尚父簋本体造型、纹样、铭文以及墓葬出土情况的梳理,本文认为,该簋带有鲜明的晋系青铜器特征,遗址中同样也反映出与天马一曲村遗址的晋侯墓地有较为接近的文化面貌,在器形、纹样的特征上仍表现出宣王时期的特点,尤其窃曲纹呈现出更加简化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晚期青铜器纹样风格发展的趋势。再对比两处遗址中侯一级墓葬的随葬器规模以及器物造型、纹样特征等方面的信息,并结合对铭文中“尚父”所指身份的推断,基本能够断定96SHYM2及尚父簋的主人就是初代杨侯——宣王子尚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茅盾的交往堪称文人相知的典范。两位巨匠以书籍为媒介,构建起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其互赠、共编、互评的实践,既是文学合作的缩影,也是思想共振的见证。

签赠之书:从文学共鸣到生活交融

鲁迅与茅盾的交往始于文学理念的契合。1921年,茅盾读到《坟》的后记时,被鲁迅“直面社会毒疮”的勇气所震撼,称其文字“妩媚”而充满力量。这一评价成为两人思想共鸣的起点。1933年5月,《鲁迅日记》记载了茅盾赠其《茅盾自选集》一事,“午保宗来并赠《茅盾自选集》一本,饭后同至其寓,食野火饭而归”。这一场景不仅展现了书籍互赠的仪式感,更以“野火饭”这一江南乡俗,将文学交往嵌入日常生活。

书籍的物理流转背后,是文人间的精神认同。茅盾曾将《子夜》赠予鲁迅,鲁迅不仅反复研读,还郑重要求茅盾签名,并专门收藏此书,这种对书籍的珍视,超越了物质层面的交换,成为两人互信的象征。

共编之书:跨国叙事与左翼文学实践

1934年,鲁迅与茅盾共同编选《草鞋脚》,将中国左翼文学推向国际视野。该书收录24位作家的25篇作品,包括鲁迅的《狂人日记》与茅盾的《春蚕》《秋收》《喜剧》。鲁迅为该书题写书名并撰写序言,茅盾则补充作家小传与期刊编目,形成“文化逻辑闭环”。这一合作不仅是文学输出的尝试,更是对“弱国文学何以自强”命题的回应。鲁迅主张“弱国可以是文学强国”,茅盾则通过译介东欧文学践行此理念,两人合力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霸权。值得一提的是,《草鞋脚》手稿现存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成为这段跨国合作的确凿物证。书籍的跨国流动,映射出两人以文学介入世界的抱负。

互评之书:批评话语与创作互启

书籍往来常伴随深刻的文学对话。茅盾是最早系统评价鲁迅小说的批评家,他在《读〈呐喊〉》中指出,鲁迅将农民置于文学中心,并开创了“新形式”的先锋性。这一论断不仅确立了鲁迅的文学史地位,也启发了茅盾自身的创作转向。茅盾在1921年8月11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鲁迅先生说‘像文学史上的一页,未必有益于国人’,真痛快,彻底讲来,自是小有影响于人心,文学史(仅仅为研究者参考)”。鲁迅所持“有益于国人的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之观点,促使茅盾从评论转向小说创作,最终完成《子夜》。鲁迅对《子夜》的评价亦充满张力,他一方面盛赞其为“右翼作家所不及”的里程碑之作,另一方面也曾直言其结构稍显松散。这种坦诚的互评,彰显了两人“和而不同”的交往底色。

遗稿之书:文化遗产的守护与传承

鲁迅逝世后,书籍成为延续两人精神纽带的载体。茅盾捐赠100大洋支持鲁迅纪念基金,并协助整理遗稿,推动《鲁迅全集》出版。1937年,茅盾将鲁迅致其的八封信件交给许广平,其中涉及《海上述林》校印的敏感内容仍坚持公开,展现了对鲁迅文化遗产的珍视。茅盾曾因《鲁迅旧诗新论》被冒名而罕见发怒斥责“文怀沙为人浮薄”,进一步印证其对鲁迅遗产的维护之切。此外,茅盾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鲁迅是提及次数最多的人物,甚至超过其妻子。这种跨越生死的书写,使书籍成为记忆重构的媒介。

结语:作为文化实践的书籍交往

鲁迅与茅盾的书籍交往,本质上是现代知识分子以文化实践介入社会的缩影。从《茅盾自选集》的互赠到《子夜》的签

(上接6版)

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云南是我国的西南门户,也是连接中国与环印度洋区域的商贸、交通和文化枢纽。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其青铜文化整体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在亚洲乃至世界青铜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该地区的青铜文化萌芽于夏商之际,至西汉达到鼎盛,东汉早期逐渐消亡。

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以滇中最为集中,被认为云南青铜文化的最高代表。滇中以滇池盆地为中心,是滇人活动的中心区域。以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为代表的墓葬中均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器,用复杂的造型真实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滇人祭祀、战争、贸易、生产、生活以及对外交流的生动场景,堪称“青铜铸就的无声史书”,也开创了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峰。

相较于滇中,滇西、滇东南等其他区域出土的青铜器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滇西以洱海、保山盆地为中心,是“昆明人”与“哀牢人”的故乡,同时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一地区考古发现以剑川鳌凤山墓地、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和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青铜器最具代表,出土青铜器明显受到北方草原文化与缅甸文化的影响。滇东南是战国中期至汉代“句町”一族的活动场所。考古发现的青铜资料主要有广南牡宜遗址、元江洼垅打箐陡墓地、个旧石榴坝墓地等,既有滇中地区的特征,又体现出与贵州、广西及越南等周边文化的互动。



亚醜铭铜钺 青州苏埠屯墓地出土



珙从解 青州苏埠屯墓地出土



云雷纹铜鼓 广西民族博物馆藏



铜鼎 寿光益都侯城遗址出土



西汉羊角钮钟 广西西林县征集



驯马场面铜贮贝器 李家山墓地出土



青銅牛头饰 晋宁石寨山出土



青銅牛头饰 晋宁石寨山出土



青銅牛头饰 晋宁石寨山出土



青銅牛头饰 晋宁石寨山出土

旧书新知

以书为媒看鲁迅与茅盾的交往

姚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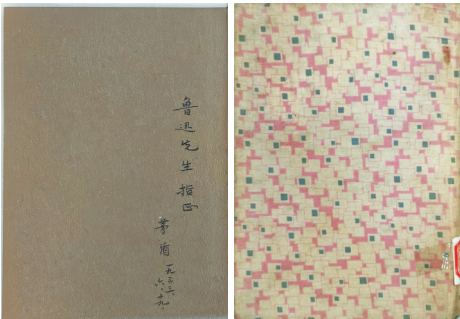


图1 鲁迅藏书中茅盾签赠鲁迅《子夜》精装初版本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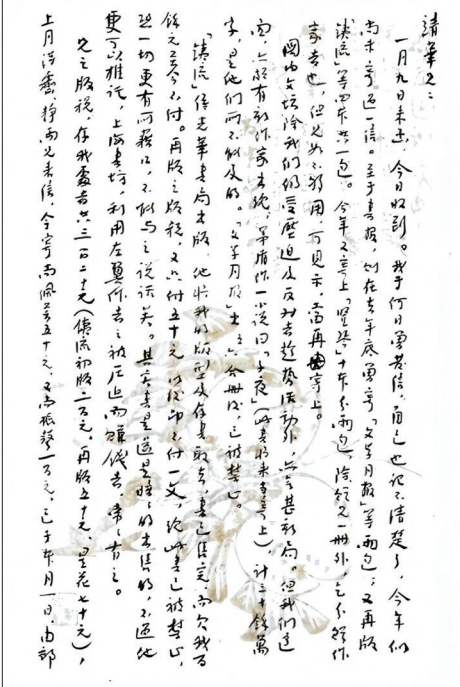


图2 1933年2月9日鲁迅写给曹靖华的信《鲁迅手稿全集第四函·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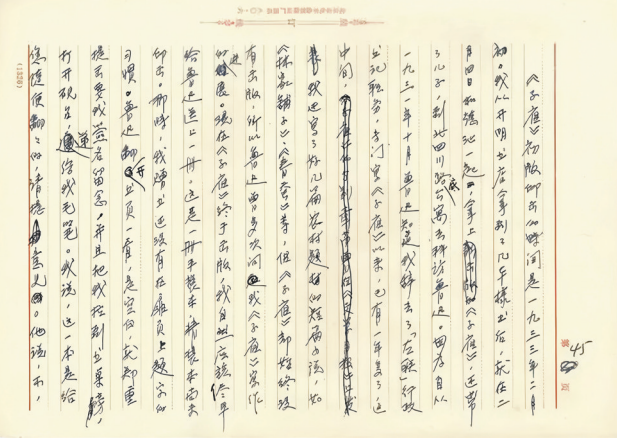


图3《茅盾回忆录——〈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手稿,韦辑手写记录 桐乡市档案馆存

名珍藏,从《草鞋脚》的跨国推介到《鲁迅全集》的遗稿整理,书籍始终承载着两人的文学理想、社会批判与文化坚守。这种交往既塑造了“双子星”般的文坛佳话,也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对话提供了历史参照。

正如茅盾所言:“他的著作是我们斗争的指南针。”书籍的流转,最终指向的是一种超越个体的文化传承。在文本与物质的双重维度中,鲁迅与茅盾的交往,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曲永不落幕的“思想二重奏”。

黔桂地区的青铜文化

先秦时期,贵州曾是“夜郎”古国的所在地,广西则是西瓯和骆越两大族群繁衍地,该地区位于古代巴蜀与南越之间的商贸通道之上,其青铜文化受到巴蜀、滇、楚、南越等多个地区文化的强烈影响,多元性特征较为突出。

考古资料证实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时代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战国秦汉时期进入发展高峰,出土青铜器不仅地域特色鲜明,例如西瓯越式鼎、扁茎无格剑、铲形或靴形钺、骆越铜鼓、羊角钮钟等。秦汉时期,随着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推进,日渐融入中华文化。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置合浦郡,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汉书·地理志》曾详细记载了从合浦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条官方航线,合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路桥头堡。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琉璃、玛瑙、水晶、金花球等珠饰,以及胡人俑座陶灯、波斯陶壶、铜鼓等见证了广西地区与域外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

中国的青铜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保持高度一致,“多元一体”是其最根本的特质。鲁、川、渝、云、贵、桂地区的青铜文化始终保持一种主动开放、兼收并蓄的态势,始终保持融入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在数千年的发展、交流、融合中,古人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与智慧,筚路蓝缕,万涓成水,汇流成河,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径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

西汉羊角钮钟 广西西林县征集